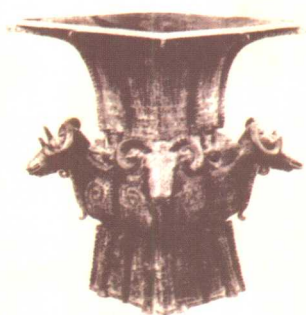


当·代·著·名·学·者·自·选·集

王曾瑜卷



兰州大学出版社

凝意斋集

C53
C572
9

当·代·著·名·学·者·自·选·集

凝意斋集

王曾瑜卷



2001733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著名学者自选集·王曾瑜卷:凝意斋集/王曾瑜
著. —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 2002

ISBN 7-311-02083-2

I. 当... II. 王... III. ①社会科学—文集②王曾瑜—文集③史学—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101070 号

当代著名学者自选集·王曾瑜卷

凝 意 斋 集

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兰州市天水路 308 号 电话:8617156 邮编:730000

E-mail: press@onbook.com.cn

http://www.onbook.com.cn

兰州市残联福利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25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267 千字 印数: 1~5000 册

ISBN 7-311-02083-2 全套定价: 180.00 元
(共十册)

“丛书”总序

兰州大学出版社总编辑张克非先生对我说，要为六十岁以上、七十岁左右具有真才实学的学者，出版一套人文社会科学论著自选集。其中，史学类要我帮忙编选十卷一辑。我想，这可能有两个理由：第一，是八十岁上下的大学者，多有出版家为他们周密策划出书事宜。有的大学者的文集、文选不知重复出版了多少套，而六七十岁的少名或无名的“青年老头”却少有人来问津。说穿了是因为后者的著作不能为出版者赚钱，甚至还要蚀本。第二，是有官衔的“学者”，因为有权势在手，不管他有学问没学问，也有办法（例如用公款支付出版费用，甚至公然买书号）令出版社为自己出文集、文选。据我所知，某些“长”字号的此类书籍，就是这样堂而皇之地出版的。即使没有人买没有人读，他们也会巍然送人，到处张扬。这两条理由，不知道克非先生是否认同，反正我是这样想的。

兰州大学出版社的盛情，令我感动和钦佩，因而不辞自身学养之浅陋，当即答应为他们选荐作者。出版社的标准就是我的选荐标准：只问学问，不问官职；只选六十至七十岁之间或略大于

七十岁的学者。这时，我不由想起季羨林先生的一篇文章中说过的
一段话：

人文社会科学同自然科学和技术是有很大不同的。科学技术专家，一到六七十岁退休的年龄，有的耳有点不聪，有的目有点不明，难以再进实验室，拿手术刀手也发颤，只好退而且休了。而人文社会科学家，则到了这样的年龄却是如日中天，正是读书写作的大好时候。即使耳目有点小毛病，甚至大毛病，也无大碍。此时，他们书读得越来越多了，知人论事的能力越来越强了，通古今之变的本领越来越高了，究天人之际的愿望越来越旺了，即使遵章退休，也往往是退而不休。

我完全赞同季老的高论，且有所补充。照我看，中国的六七十岁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大多在人生和学术道路上坎坷多难，饱经风雨沧桑，不乏伤心切肤之痛。然而，他们从未颓唐不振，反而因为心灵深处拥有忧患意识，历史使命感、社会责任感、独立思考和敢于重新评估一切的怀疑精神，使他们晚年生活追求中始终不曾忘却对人文社会科学尽自己一份承上启下、承前启后的责任。他们虽面对权威和虚假，却甘于清贫和寂寞，以信念、醒悟和批评，诉求真实，尊重歧异，鄙弃教条，质疑权威，敢于应对非学术因素干扰下学术领域的种种挑战。

我的专业是研究1840年以后中国近代史，所知只有一百多年的史事，而对中国古代史和世界史则知之甚少。不负所托，为了审慎地选荐丛书各卷作者，我便向这两个学科的专家和老朋友请教。世界史，我请教于苏俄史专家陈之骅先生；中国古代史，我请教于明史专家王春瑜先生。之骅谦虚地说他自己的文章暂时没有时间整理，他诚恳地推荐英国史专家王章辉先生，王先生欣然俯允。春瑜除承诺自编一卷外，又热心推荐汉唐史专家张泽咸

先生、宋辽金史专家王曾瑜先生，张、王两先生亦积极响应。中国近现代史方面，我敦请王桧林、张汪洪、马连儒、唐宝林四位先生予以支持。桧林先生以主编《中国现代史》（高校教科书）、研究中国现代思想史、抗日战争史而名满学界。汪洪先生以研究中国现代史科学与信息学而著称。马连儒编审主持《人物》杂志多年，对中国现代历史人物研究既深且精。唐宝林研究员近二十年间以研究陈独秀和托派历史知名于海内外。在以上八位先生的选荐过程中，我始终在寻找马大正先生。他是边疆史地和少数民族史专家，我虽不研究边疆史地，但一向关注这个领域的研究成果。大正其时正在新疆考察，直到一个月后才联通敲定。

九位先生中，六位是旧雨，三位是新朋且从未见面。他们的研究领域涵盖汉、唐、宋、辽、金、明、清、民国，边疆少数民族史和英国史诸学科。我稟性愚鲁，才疏学浅，对上述许多领域相当外行，不敢妄评诸公学术成果，但据平时涉猎，参照学界品评，我深信他们都是各自学科中的一流学者。在近二十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进程中，他们以其非凡的学术成果为本学科作出了独特的有些是无可替代的学术贡献。这种贡献的深层意义，在于他们摆脱了长期流行并主宰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二元思维定势”，即非好即坏、非美即丑、非善即恶的简单化绝对化的思维方式。对于他们的研究成果，人们可以见仁见智，乐山乐水，可以提出种种批评见解，但在学德和文品上，他们绝不会愧对广大读者，这就是：

——历史家的第一品格是真诚，是无所禁忌，秉笔直书，而非附庸政治的奴婢。

——历史学的第一标准是真实，是信史，是史镜，而非“胜利者的宣传”。

我坚信，这应当是时下和未来历史学主体和客体的正确的发

展方向。这也是高悬于我和所有作者面前的崇高的目标，追求之心不敢稍懈。

陈铁健

壬午谷雨后四日，京东亮马河畔水南斋

自序

目前时兴广告热,不少学界人士颇热衷于给自己做广告。我有一次对好友王春瑜先生用开玩笑的口吻说:“我的广告是八个字:先天不足,后天失调。”这表明本人尚有自知之明。与优秀的前辈学者,例如我的老师张政烺先生、邓广铭先生,长辈漆侠先生等相比,我心悦诚服地承认,自己在学问上有难以企及的差距。我喜欢与中年、青年学者当平等的朋友,欢迎他们直率的批评和争论。因为我相信,他们之中的一部分人,日后的成就是会在我之上,甚至会超迈自己可望而不可及的前辈优秀学者。但是,有时我对某些似乎是领时代风骚的学术界宠儿和骄子,却显得高傲。问题还不全在学问,而主要是我瞧不起他们的为人,人品必定影响学问。

在惨痛的十年浩劫期间,我的精神甚至可以说是悲观到接近崩溃的地步,是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是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教训,才使我重新鼓起生活的勇气。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事实上成为我重新学习中华古史的课堂。原来中华古史与今史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今史中各种纷繁复杂、令人眼花缭乱的现象,其实不难在古史中追本穷源。我终于领悟了古今一揆的哲理。我被迫在痛苦中反省中国史学的道路,中国史学

家的学术生涯。

前辈郭沫若先生当然是一位大才子，他才气横溢，绝顶聪明，一些别人下了成年累月死功夫的学术问题，他稍下功夫，即能点铁成金，超越他人。他是史学界中唯一兼写文学作品者。我们这一代人，几乎无例外地受他文学和史学作品的影响和熏陶。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十批判书》中对法家极端专制主义的批判，真精彩，真犀利，真深刻，堪称是千古不朽的史笔。在蒋介石的专制统治面前，他确是个当之无愧的民主斗士。

但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郭沫若又拥有与前迥异的双重身份。一方面是学术文化殿堂里的第一尊神，受到人们顶礼膜拜，有时香火颇旺，却全无灵验。另一方面又是权势的帮闲，外界因素是权势，内在因素是媚骨，压抑，甚至吞没了他的才华。他的作品活像一个风标，经常被政治龙卷风刮得团团转，不辨东南西北。不少作品只能成为贻羞千古的笑柄。他丧失了文人学者应有的独立人格，简直似乎已经没有自己的思想，只是简单地充当权势的录像带或传声筒。虽然已经竭尽了奴颜婢膝之能事，却是照样被权势侮弄于股掌之中。我曾见过他的一个儿子，虽然没有说话，但是他颖悟、英锐，在他身上似乎见到了其父年轻时的身影。可惜后来在文革时被活活整死。尽管《十批判书》挨了政治批判，又有丧子之痛，郭沫若却还是不改旧辙。过去勇敢批判法家极端专制主义的似乎不是他，而是另一个郭沫若。1976年初，他发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诗篇。曾几何时，又填词“欢呼华主席”，说“四人帮”“迫害红太阳”。以至最后编《郭沫若全集》时，此类不合时宜的文字就被痛加删削。其实，白纸黑字，铁案如山，被删削后的所谓“全集”既然不能完整地、真实地反映郭沫若的学术生涯，因而也不具备人们常说的科学性。

不要以为我快意于对郭沫若先生的批评，我真是为这位前辈

的大才子,为他悲剧性的学术生涯,深感惋惜和悲哀。当我入大学之初,正逢所谓又红又专的辩论,郭沫若当然被奉为学术界又红又专,值得青年人歆羡和效法的主臬。然而痛苦的现实却迫使我逐渐清醒,决不能重蹈郭沫若先生后半生的旧辙。因为我是人,是中国学者,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在官迷面前,我是堂堂正正的社会主人。我逐渐痛心地觉悟到自己身上存在的奴性,因而也必须通过自己的行事和论著加以洗刷。我逐渐意识到,写文章的第一要义,就是摆正自己作为社会主义一员的地位,必须以社会主人的身份和资格说话,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王春瑜先生喜欢陆游一句诗:“位卑未敢忘忧国。”但是我们毕竟处在一个应与陆游完全不同的时代,按照马克思主义,我们就应是“位高未敢忘忧国”。高就高在社会主人的地位,不需要,也不应当低三下四。媚骨必然扼制史才。

学术的发展当然需要有正当的、公平的竞争,但既然存在着人们常说的官本位,学者的地位和价格,就必然与权势发生关系,任何人也不得逃脱。学术竞争也会蜕变为与权势亲疏厚薄的竞争。鱼翅和熊掌不可兼得,实惠与名节也往往难以两全。在外界看似神圣的学术文化殿堂里,很多人却在做浑水摸鱼的勾当,也是势所必然。

在与权势亲疏厚薄的竞争中,我当然不是成功者。但使我感触很深的,还是最近因为乔迁之喜,得以接触一些行业的外地民工。文革前和文革中,我曾去过农村,多少知道一点位于社会底层者的生活。这次我重新了解一点民工,原来马克思和恩格斯笔下残酷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还是在中国大地上再现。日月虽明,不照覆盆之下,广大民工甚至享受不到诸如劳动法、工会法的阳光,他们就是生活在覆盆之下。他们一般工作十多小时,而不知八小时工作为何物。有的人因为无力长期坚持此类劳作,只能重返乡

村。一些民工的日常“营养”只有大米、白菜、萝卜和盐。他们不高的工资,还不时受到“企业家”的无理克扣,而不知工会为何物。更有甚者,当然是诸如广西一个“优秀乡镇企业家”属下活活淹死的矿工,而威胁死难者的家属不得告状;一个未成年的少女,因长期超强度、超时间的劳作,而倒死在作坊。当我向王春瑜先生讲述自己接触外地民工的见闻时,他不免感叹说:“我们还是生活在社会上层。”是的,我们无法与花天酒地的大款和贪官相比,也无法与学术界似乎是领风骚的宠儿和骄子相比,但与外地民工相比,我们在待遇上还能有什么抱怨?

我所写的一首七律的后四句,可以代表自己进入暮年后的心境:

乌髻白发浮生短,齐简晋笔傲气存。剩有老蚕丝未尽,孤灯青史送黄昏。

中国悠久的史学当然有其光荣传统。有人端出所谓“盛世”修史,宰相监修国史之类,作为要今日学者继承的古代史学的光荣,实为混珠之鱼目,其要价却是二亿五千万的民脂民膏。如文天祥《正气歌》中歌颂的“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才是中国古代史学传统的一颗骊珠。好生恶死,趋利避害,求福免祸,乃是人之常情。然而他们为了追求直书,而不惜承受杀生之祸,足以体现中华古史学的崇高。

我深知自己学识的浅薄,深知个人力量的微弱,个人一点作品在浩瀚的知识海洋中,连一滴水的地位还不够格。有位朋友曾说:“你写的文章能起什么作用。”我的回答是“不计成败利钝”。这句话是脱胎于诸葛亮的《出师表》,但我不敢以“鞠躬尽瘁”自命。既然有了前引顾炎武的教训,自己就应当为祖国和民族的利益,尽一点匹夫之责,人到老年,就不必有成败利钝的顾忌。不抓紧时间,讲一些真话,发一点心声,又更待何时。让别人走他们的阳关道,

我走自己的独木桥。

编入本自选集的有三部分文章。一是历史论文,占主体地位,二是小杂文,三是关于我撰写历史小说的一点体会。

关于个人的一些治史情况和体会,在开头《我和辽宋金史研究》一文中已有交待,在此不必重复。《王安石变法简论》代表了研究这次变法的一种见解。我写过不少经济史方面的文章,但因文字颇长,在此只选两篇较短者。其中《中国经济史和宋史研究的重大成果》是一篇书评,却并非就书论书,别具一格,如今学长漆侠先生竟成故人,也以对其《宋代经济史》的书评,而深致怀念之意。《辽朝官员的实职和虚衔初探》是长篇考证文字,代表了贯通辽宋金史的研究。《和尚原和仙人关之战述评》是军事史论文。其他文章则属于对中国古代专制传统的批判和反省,涉及历史哲学,其中《绍兴和议与士人气节》一文还涉及对宋高宗、秦桧降金乞和政策学术争论。《降金乞和与文丐奔竞》一文,则是用杂文的笔调,讥刺宋高宗和秦桧亲自发动和导演的自我文化造神运动,剖析专制统治者那种自欺欺人,寻求自我麻醉的变态心理。用好友张泽咸先生的评价,与我众多的论文风格颇异。

在文革期间极端苦闷时,我曾大致通读鲁迅先生的杂文,而深深敬服其杂文的精妙和深刻。但自己万没有想到,近年来,居然在王春瑜先生的引领下,也开始写一些杂文。搜入本集的五篇短文,都曾经产生一定的社会影响。使我惊叹的,是自己花费成年累月功夫写就的史学专著,其社会效应竟不如花一天半日写就的一篇杂文。

历史小说是我新近涉足的领域。本集所搜的三篇一谈了一点对历史小说的己见和写作的体会。

目 录

丛书总序	1
自序	1
我和辽宋金史研究	1
王安石变法简论	16
中国经济史和宋史研究的重大成果	57
宋朝户口分类制度略论	69
辽朝官员的实职和虚衔初探	84
和尚原和仙人关之战述评	130
从台谏制度的运作看宋代的人治	148
降金乞和与文丐奔竞	192
绍兴和议与士人气节	208
秦桧独相期间“柔佞易制”的执政群	
——兼论时势造小丑,小丑造时势的历史哲学	223

中国古代文化专制主义批判	283
腐败就是今天的国耻、党耻	307
巴黎公社原则和苏维埃政权的灭亡	312
也谈劝戒贪赃的《戒石铭》	318
空头主编满天飞	
——《煞风景的考证之一》的续貂	320
主编瘾和广告热	323
宋代纪实小说系列《靖康奇耻》序	327
再序	333
关于历史小说创作的己见	339

我和辽宋金史研究

我们这一代治史者可说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这是无可争辩的客观事实。

我1957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1962年毕业,号称是五年制本科生,真正的学习时间其实只有两年。我曾在为《北大人》所写的自传中说:“在世界近代史上,北京大学对本国历史进步所起的推动作用,非世界各国其他名牌大学所可比拟。多灾多难的校史,在某种程度上可说是多灾多难国史的一个缩影。北京大学校史中最可痛心的损失,自然是很多代学子,在不正常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中学业的损失。”

大学生活的第一学期,还可说有正常的学习环境。张政烺先生讲授先秦史,我受了他的启示,开始阅读《史记》。按当时的中学教育水平,刚进大学校门的学子,阅读中国古代史料,是有极大的困难。我是从王伯祥的《史记选》着手,才慢慢度过古文关,转而能够阅读没有标点的《史记》。

1957年寒冬,一位专门加强政治领导的新官上任,从处分右派开始,接连三年,在几乎没有间断的政治运动和体力劳动的冲击下,我们的学业近于荒废状态。在陈伯达“厚今薄古”的口号下,阅

读古籍更成了违禁行为。记得在大跃进的1958年夏,我们整理行装,准备下乡,不料我突然发烧,去校医院看病,医生认为我可能得猩红热,留我住院。烧退以后,医生又认为必须住院观察。我终于利用这一二十天的宝贵机遇,偷着去借书。文史楼中,往日座无虚席的大阅览室里,竟空荡荡的,没有一个学生,唯有一位管理员在打盹。我借着几本书,就赶紧塞进书包,唯恐被别人看见。回校医院后,又赶紧将几本书放在枕头下,因为如果有同学看望,发现有此类违禁品,无疑会成为一条颇大的“白专”罪名。

直到1961年春,极可悲痛的大饥荒,反而成全了我最后一年半的学业。当时的北大学生在忍饥挨饿的境遇下,许多人还得了浮肿等病,却仍刻苦攻读。天色未明,大批学生就早早起床,阅览室还未开门,门外就已经排成长龙。此情此景,虽然事隔近四十年,却还是历历在目,不免使年近花甲的我,感奋落泪。国应有国魂,学须有学魄,学习积极性的备受摧残,却更激发了学子们渴求知识,发愤用功,这难道不是北大学魄的最好写照?

在不正常的政治气氛下,分专业竟成了难过的一关,一些同学迫于政治压力,不敢报名中国古代史专业。我和另外一些同学虽然硬着头皮报了名,却怀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记得本班学生第一次分专业聚会,彼此才发现,原来竟都是一批程度不同地被指责为走白专道路的人,不免有一种芒刺在背之感,大家情绪低落,面色难堪,一言不发。我们当时的那种心理感受,也许是后人永远无法体会到的。

在经济严重困难时期,老师们才敢于对学生提出基本训练的要求。人们对历史研究的基本训练可以有各种说法,而最重要的一条当然是通读前四史和《资治通鉴》。我利用了最后一年半的机遇,终于通读了《资治通鉴》和《汉书》、《后汉书》。

我上学的时代可说是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全盛期,特别是在中

国古代史领域,每个断代史都有名家,尽管他们还不一定有教授的头衔。老师们授课的内容,随着时移事迁,在自己的记忆中自然逐渐淡化,但是,他们一些金针度人式的治史要诀,却是记忆犹新,受用终生。例如邓广铭先生提出,年代、地理、职官和版本目录为治史的四把钥匙,我是从一张批判揭发的大字报中学到的。齐思和先生说:“研究历史,不在于能记得多少史料,而在于能查到多少史料。”这是在讲堂上学到的。商鸿逵先生说:“会读史学作品的看注,不会读的看正文。”这是听同学转述的。我后来养成一种习惯,读论文先看注释,后读正文。审稿时,凡是见到注释中大批使用诸如《宋史纪事本末》之类隔代史籍者,可推知作者必定是宋史研究的外行,可以不看正文,径予退稿。

在大学生活的最后阶段,我有幸在邓广铭先生的指导下,写学年和毕业论文。记得后来老师曾对我说:“其实我对你的指点并不多。”这句话说了一方面的事实,而更重要的另一方面,则是指点虽然不多,却具有关键性。记得我几次学业上陷入困境,老师只用几句指导性的言语,就足以收到拨云见日之效。一个人治学入门最困难的阶段,也许是从爬行改为直立行走。没有邓先生的扶掖,自己就很难结束爬行阶段,这是应当终生铭感老师的。

另一位值得一提的是聂崇岐先生,他正好是在所谓“调整”时期,才得以来北大讲授中国古代官制。我们中国古代史专业的同学有幸成为他最后的一批学生。他授课从来不带任何书籍或片纸,提起粉笔,就随手写下一段段古文。对于他的博闻强记,我们这批学生真是敬若神明,惊叹不已。然而他正是在我们毕业前猝然逝世,至今依然使我感到伤痛和惋惜。

人们通常认为,大学时代是人生的最幸福的阶段,桃李芬芳,弦歌一堂,充满了诗情画意。可是我们很多人回味大学生活,却是苦、酸、辣俱全,而少有甜意。但是,大学生生活毕竟是自己治史的起